

# 儒家的财富观

周桂钿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儒家重视富,要求以正当的方式致富,特别强调富裕以后要进行教育。财富观教育,要从当官开始。当官的不要想发财,要用正当礼仪引导群众发财。当政者要允许一部分人通过正当劳动发财,要按不同的地位获取适当的报酬,反对平均主义,同时也反对贫富差别扩大,要利用政权进行调均,实现第二次分配。政府要将财富藏于人民中间,反对敛财,盘剥人民,官营企业弊多于利。

**关键词:**儒家;财富观;官营企业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9)05-0059-08

许多人生活提高了,钱多了。如何看待财富?如何发财致富?如何运用财富?就是如何赚钱和花钱?应该说,这是有很多讲究的,也有很多人为此感到困惑。我想中国古代儒家的财富观,也许对我们有所启示,可供我们参考。因此,我就整理儒家的财富观,向大家作一介绍和评述<sup>①</sup>。

## 一 财富是什么?

财富,古代儒家说成富,也称“利”。中国历代儒家论财富者甚多,今人仍常有新见。可见,这个问题,古人没有完全解决,今人也还论不清楚,因此有再论的必要。当然,也不是这一论就可以定乾坤,就没有别人说话的余地了。我以为,富也将和爱情一样,是一切思想家不断探讨的永恒课题。

《论语·子路篇》载:“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孔子说卫国的公子荆善于管理家业。刚有一点财产,孔子就说:“差不多合格了。”稍微增加一些财富,孔子又说:“这就比较完备了。”当他富裕的时候,孔子就说:“这就很美好。”合、完、美这三个字:合是基本合格,完是比较完备,美是相当美好。

财富越多,孔子的评价也越高,说明孔子是支持富裕的,赞美富裕的,认为财富是美好的,反映了孔子对财富的基本看法。儒家主张推己及人,自己喜欢富,也要让大家富,让人民也富起来,孔子有共同富裕的思想。于是,“恭喜发财”成为社会通行语,“招财进宝”、“升官发财”、“发财致富”,这些平民所企盼的,都离不开一个“财”字。

有些儒家认为,好义与欲利是人生来就有的天性,也是必需的。如荀子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荀子·大略》)董仲舒也说:“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利是养身体所必需的,人需要利也是与生俱来的本性,是正当的,即使圣人也不能去掉民众的欲利之心。不过,圣人可以教育人民“欲利”不要超过“好利”;一旦超过,就可能破坏人际关系,引来很多麻烦,其结果可能丧失更多的利。为了社会和谐,也为了自己生活得更好,儒家主张重义轻利。因此,董仲舒说:“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而厚于财也。”(《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正义对于人

收稿日期:2008-10-20

作者简介:周桂钿(1943—),男,福建长乐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国际儒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

生来说,比财富更重要。现代人的认识:财富是什么?有它的日子不好过,没它的日子更不好过;多了未必好,少了更难熬。它像药,用得对症,可以治病救人、和睦家庭、造福社会;用得不对,就会糟蹋身体、破坏家庭、毒化社会。财富就是这样奇异的东西。财富有两面性,它首先是美好的,或者说它本身是美好的,另一面是被无知无德所歪曲了、所利用了。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没有特别高尚的品德,喜欢讲仁义,长期处于贫贱地位,也是不光彩的。

总之,儒家认为财富是好的,但要加以分析,一是如何挣来的,二是如何用的,取之以道,用之于义。

## 二 致富之路在何方?

财富是美好的,人可以追求财富吗?孔子认为“富贵在天”,富与贵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是人无法强求的。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篇》)如果能够求到富贵,那么,孔子愿意从事低贱的工作(即使充当驾驭马车的车夫)。要注意:低贱不是卑鄙。如果自己的努力求不到富贵,那么,就可以按自己的愿望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孔子说颜回:“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篇》)颜回水平高,道德也高,就是太穷了,缺乏的正是财富。颜回的学问道德都不错,就是太穷了。当然,孔子的学生就有不听命运安排的,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致富。典型的有端木赐即子贡。他不受命运的支配,从事商业活动,由于预测市场行情比较准确,赚了很多钱。而道德和学问都比端木赐强的颜回,不肯出去做生意,也不当官,只是守在家里受穷,在贫病交加中英年早逝。颜回英年夭折的教训,也说明财富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孔子对他们两个作了比较:“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篇》)孔子另一弟子曾参,《韩诗外传》卷第一章载:“曾子仕于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时,曾子重其禄而轻其身。亲没之后,齐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方是之时,曾子重其身而轻其禄。怀其宝而迷其国者,不可与语仁。窘其身而约其亲者,不可与语孝。任重道远者,不择地而息。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仕。”意思是说,曾参开始为了养亲,薪水很

低,他也去任职,这时他“重其禄而轻其身”。亲没以后,齐、楚、晋各国都来聘他任大臣,这时他“重其身而轻其禄”。因此,他“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仕”,没有养亲的问题以后,他就慎重选择国家,自己的身体就是最宝贵的财富,不轻易许人。

孔子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认为从事农业生产,发不了财;要发财,首先要学好文化。他说:“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学习文化就是追求富裕的普通途径。所以在儒家看来,富是可求的,也是不可求的。从可求的角度讲,谋事在人;从不可求的角度讲,成事在天。能否求到财富,是社会多方面因素的综合结果,其中包括客观条件与主观努力。而这综合因素,古人不清楚,将其归结为“天”或“天命”。

司马迁认为,富是必要的。他说:“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就是由于富而受到秦始皇的表彰。《史记·货殖列传》说:“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在和平环境中,空谈仁义,不会挣钱,长期贫贱,那是“足羞”的。后代人概括儒家的致富思想为:“君子爱财,取之以道。”这个道就是正道,不是歪门邪道。正道就是通过诚实的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发财致富自然是正当的,合理合法的。

如何发财致富,还是有高低之分的。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有精彩的概括。他说:“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本,指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生产。生产致富是最好的。末,指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必要环节,包括小手工业、加工业、商业、运输业、服务业。通过这些加工、转运、倒卖的活动致富,是第二等的。最下等的是奸富,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谋取暴利。古代有盗墓、抢劫、偷盗、欺骗等;现在小的则有制造伪劣商品、偷税漏税、缺斤短两、违法乱纪等等,大的有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贩卖毒品、倒卖军火、盗卖文物古董等。在中国传统观念中,通过歪门邪道、损人利己、危害社会而达到发财致富的,都属于奸富,发的都是不义之财。为了倡导正当发财,反对奸富,司马迁历数当时各地贤人怎么致富的,供后人参考。他们有的开矿冶铁,有的做鱼盐生意,有的从事长途运输、贩卖粮食,有的种果树、养牲口,有的在乱世抛金玉、藏粮食,他们“皆非有爵邑俸禄弄法犯奸而富”,他们都有一些绝技招数,因此“富者必用奇胜”。“富无经业”,指发财致富没有一定的行

业,只要有奇术,哪一个行业都能够发财致富。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同样也可以说:世上三千业,业业能致富。

### 三 为什么要富而后教?

《论语·子路篇》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段记载是非常重要的。大意是:孔子到卫国去,他的弟子冉有为他赶车。孔子说:“人真多呀!”冉有问:“人已经很多了,又该怎么办?”孔子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已经富裕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化。”后人将其归纳为“富而后教”。富而后教就是孔子儒学的重要思想。富以后,如果不进行教育,那就会堕落、腐败。

富是美好的,掌握财富的富人却未必都是美好的。什么样的富人不美好呢?一是只富自己、不富别人、不富人民的统治者。例如:齐景公自己很富,“有马千驷”,但他不给人民办事,没有做出什么好事,所以当他死时,“民无德而称焉”(《论语·季氏篇》),人民找不出他值得歌颂的道德。二是不义而富的人。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篇》)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富贵,对于孔子来说,就像浮云那样虚无飘渺,不增加什么乐趣。哪些手段是不义的呢?孔子没有明说,孟子称这些富人为“为富不仁”。

富是双刃剑,需要有文化、道德相配合。有文化、道德的人称为君子。孔子认为“君子固穷”,虽然穷困,却也不胡来,仍然坚持自己的道德情操。因此,“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篇》)。平时想的做好事,不要斤斤计较,“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只为财利而行动,就会招来很多怨恨。有的人为了实现富裕,就做不仁的事,孟子说“为富不仁”,司马迁称为“奸富”。荀子曾说:“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士不言通货财……从士以上皆羞利而不与民争业,乐分施而耻积臧。”又说:“上好富则民死利矣。”(《荀子·大略》)上级喜好富,老百姓就会为了利而拼命,乃至死亡。富原为好事,道德不好,富却成了坏事。西汉老臣疏广说:“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汉书·疏广传》)子孙如果是贤者,多给他们财富,就会减损他们的志向;如果子孙是愚蠢的,多给他们财富,就会增加他们的罪过。无论如何,多

给子孙财富,都是没有好处的。疏广给子孙留一些田产,只要努力生产,足够供给衣食,能够过着与周围平民一样的生活。他又说:“吾既亡(无)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汉书·疏广传》)没有什么可以教育子孙,只是不要再增加他们的罪过而引起人们的怨恨。最近连续十几年评为世界首富的比尔·盖茨将自己的580亿美元的财富全部捐给他命名的慈善基金会,不给自己的子女留一分钱,这在中国先富起来的人群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总编辑卢勤(知心姐姐)主张:“不要把财富留给孩子,要把孩子变成财富。”她的十大信条是:认识孩子,尊重孩子,调动孩子,帮助孩子,引领孩子,开放孩子,激励孩子,享受孩子,保护孩子,磨炼孩子。2000年前的疏广,4万里外的比尔·盖茨,跟“知心姐姐”卢勤,所见略同!关于这一点,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曾说:“子孙若如我,留钱有何用?子孙不如我,留钱有何用?”这些明智的思想渐渐被更多的富人所接受。

君子富起来后,不能骄傲,更不能骄横,就是“富而无骄易”(《论语·宪问篇》)。普通百姓一旦富起来,容易骄横,因此需要加强对他们的教育,使他们提高文化、道德水平,在富裕之后不至于骄横,这就是“富而后教”、“富而好礼”。如果富裕了,不能及时给予教育,新富起来而又缺乏教育的人容易骄横为暴,什么坏事都敢做,严重危害社会。按孟子的说法,这种人就跟禽兽差不多,即:“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富裕以后,头等大事就是教育。考虑不到这一层,就是没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孔子希望有文化、有道德的人先富起来。如果“上大学赚小钱,上小学赚大钱”,那么,这对教育界就会产生误导作用,使人们轻视教育。口头上讲教育的重要性,作用甚微,无人相信,而实际的导向作用极大,不容忽视。如果让很多道德败坏的人、敢于违法乱纪的人先富起来,“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遵纪守法的人、诚实劳动的人反而富不起来,那么,社会风气的败坏就是很自然的。有的明星发财了,引导很多青年学生报考艺术专业、传媒专业。孔子说“君子不器”,就是说君子应该有较高素质,能够适应社会的各种需要,不能只有一种本事,只会一两种技能。孔子说子贡是器,是什么器呢?孔子说是“瑚琏”。瑚琏是什么?古代祭祀时用来装粮食的祭器。这是珍贵的,用于比喻珍贵人才。

这里也有这样的意思:子贡能够致富,成为百万富翁,又很高尚,但毕竟不如颜回那样有圣人的气质。毕竟是器,境界还不够高。孔子也肯定子贡可以做官,因为他很通达。

孔子论富,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把物质的富裕与文化道德相结合,在讲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重的时候,更强调精神文明。他说:“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篇》)。二是同他人共富。社会安定,大家共同富裕,才是最美好的社会。别人都很穷,只有自己特别富裕,那么,生活也不安全,整天提心吊胆,日子也难过。少数人发国难财,那是不义之财,早晚要受到惩罚的。

孔子论富中有两点需要分析。一、富贵在天。把富裕的希望寄托在天上,显然是消极的。后儒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是积极的。但要认识到,致富除了个人努力之外,还有机遇问题。而机遇就是社会、自然界各种客观因素的综合效应。这是人的主观意志所控制不了的,古人把它称为“天”、“命”或“命运”。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就是指各种客观因素的总和,也就是机遇。二、耕与学的问题。孔子认为,从事农业生产的耕只能得到饥饿,而学习文化才能当官获取俸禄。在当时,学文化、当官、发财,是一条路子。现代社会不同了,发财致富的路子就不是一条,而是千万条,所谓“行行出状元”,各行各业都有致富的路。只有当官不应该是致富的路子,当官致富是从人民那里受贿或贪污而来,那是一种犯罪。现代,学文化仍然是一条致富的路子,有了文化,可以学科学,科学致富是比较普遍的。因此,学文化致富,在现代社会,有了新的解释,也有了新的合理性。文盲耕地,贫困为常事。在现代,有了科学文化,就是耕地也会发财。

关于教育的问题,孟子有很多精辟论述。比如他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梁惠王上》)教育是仁政的基础。政治与教育相比,“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孟子·离娄上》)。礼与学,都是教育的内容,如果没有教育,贼民就很猖獗,亡国指日可待。因此,人的生活好了以后,如果不进行教育,就会变得与禽兽差不多。人性是善的,教育就像水土那样滋养着,善性才能发展。“苟

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出现问题,尽量从自己方面寻找原因,“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孔子反对迁怒于别人,也是这个意思。磨炼意志是孟子十分强调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这是被引用次数极多的经典说法。现在很多人已经不理解其中的深意了。教学方法,孟子有独特的见解:“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孟子·尽心上》)“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下》)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孟子则有许多教学经验,方式多样,灵活机动。他们才是真正的人师,而不是教书匠。孟子主张学习要专心致志,要循序渐进,“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

#### 四 当官如何看待财富?

当官的如何对待财富?首先,不要想发财。当官如要发财,就只能通过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发的都是不义之财。因为从人民那里收来的税赋是有限的,再作为薪水分给天下官吏,不可能太多,因此靠薪水发财是不现实的,古今中外也没有靠薪水发大财的。想发财的,就不要去当官。想通过当官来达到发财的目的,这是危险的想法!荀子认为:“从士以上皆羞利而不与民争业,乐分施而耻积臧,然故民不困财。”(《荀子·大略》)统治者都要“羞利”,不与民争业,乐于施舍,耻于积累财富。因此,“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士不通货财”,“上好富则民死利”(《荀子·大略》)。荀子讲“羞利”,司马迁以贫贱为“足羞”。这两说表面看似相互矛盾,实质上它们都符合孔子的思想。乱世,富为羞耻;治世,贫为羞耻。孔子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篇》)又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篇》)政治混乱,百姓穷困,自己却很富,那是可耻的。政治清明,百姓安乐,自己有俸禄。政治变坏了,自己还是那样拿着俸禄,也是可耻的。国难当头,百姓悲哀,少数人却发了财,这叫发国难财,是不义之财。透过这些说法,我们体会孔子的意思是要与人民同甘共苦。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篇》)就是说,统治者要与

人民共同富裕，不要只顾自己发财，不顾百姓受穷。百姓都很穷，只有自己富，那就是不义的，也是保不住的。富人未必都是高尚的，因此嫌贫爱富，是一种盲目的追求。孔子认为，盲目追求富，就是“惑”，就是没有信念、没有理想，就是精神贫困。就是说，当官的不要想发财致富。要想发财致富，就可以去发展生产或者下海经商，这叫正当劳动致富。司马迁讲的是和平环境下的士人，空谈仁义，长期贫贱，是“足羞”的；荀子讲的是在乱世，执政者“皆羞利”。关于哪一种“羞”，都需要加以教育。

其次，不与民争利。财富是美好的，当官的责任是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正当经营，发财致富。自己与民争利，自己富了，人民穷了，这就是贪官污吏。《淮南子·道应篇》：“公仪休相鲁而嗜鱼，一国献鱼，公仪子不受。其弟子谏曰：‘夫子嗜鱼，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鱼，故弗受。夫受鱼而免于相，虽嗜鱼不能自给鱼；毋受鱼而不免于相，则能长自给鱼。’”公仪休任国相，有人投其所好，给他送鱼来，他不受。了解他的人说：“您不是很喜欢吃鱼吗？给您送鱼来，为什么不要呢？”公仪休说：“我收了鱼，以后当不成国相，就没有人给我送鱼，我就吃不上鱼了。我不收鱼，一直当着国相，还怕没有鱼吃吗？正因为我爱吃鱼，所以我不收别人送的鱼。”当时有人议论，认为，公仪休真正会为自己打算，真正懂得珍爱自己。贪近利，受献鱼，贪污受贿，免了相，自己不能自给鱼，别人也不会再献鱼，到那时想吃鱼就吃不上了，只能吃后悔药了。不贪近利，保住相位，优厚的俸禄足够他长期自己买鱼吃。这里当然也有近利远利的问题。不贪污受贿，这是容易理解的。董仲舒认为，公仪休还是不与民争利的典范。公仪休任鲁国相，他办完公事回家吃饭的时候，就问葵菜价钱，家里人说不要钱，是自己家种的，他听后很生气，说：“我们拿了俸禄，还要自己种菜，这不是夺了菜农的利益吗？”说完就到菜园里，把葵菜都拔掉。他有一次回家，看见夫人正在织布，他认为她夺了女工的利益，就把夫人休了，这是有名的“拔葵出妻”的故事，见《汉书·董仲舒传》。这种情况，有的说是不与民争业。在延安时代，由于农民生活困难，庞大的抗日队伍给农民的负担过重，中国共产党发动干部与士兵参加生产劳动，自力更生，保障供给，减轻农民负担，改善自己的生活。这是正确的路线。当时的“自力更生”后来成为了口号。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居然还有人提倡公务员搞创收，教授在放假的时候上街卖烧饼。如果说一个教授的薪水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说明这个政府太不重视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的待遇太低了。如果作为一个教授，薪水够花，不认真研究学问，利用放假时间卖烧饼，一个多月赚70多元钱而沾沾自喜，这是什么教授？刘乃和先生告诉我：“那决不是一个好教授！好教授吃烧饼都感觉没有时间，哪有时间卖烧饼？”有的中小学教师卖面条，也都是与民争业的表现。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做好本职工作，那才是最重要的。

第三，抑制富者，救助弱者。实施调均政策，防止贫富差距严重扩大，这是决策者的主要责任。当官者也要在自己的权限之内，注意这个问题。后面还要详细讲到。

第四，要富而后教。对富裕起来的人民进行道德教育，提高文明素质，移风易俗，建立和谐社会。董仲舒提倡：“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他从政治大局来考虑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现实是高贵的人贪得无厌，越富越贪利，越不肯为义，骄奢淫逸，违法害人；贫困的人越来越穷，过着悲惨的生活。这种两极分化，必然造成社会混乱。富者无恶不作，穷人只好落草为寇，社会秩序怎么能安定下来？

## 五 政府如何对待财富？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土地是分封的，有爵位就有土地，土地没有进入交易市场。秦汉以后，实行郡县制，土地才开始买卖。一旦土地开始买卖，当官的就利用手中的权力，采取巧取豪夺的办法，占领一大片一大片的肥沃土地，平民百姓就大批大批地失去土地，结果“富者田连仞伯，贫者亡立锥之地”，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书·食货志》），再加上“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然后抓来判刑，一年判了千万人的罪，路上行人有一半是罪犯。董仲舒从实际出发，具体分析了汉代两极分化的情况及其社会原因，认为主要是当官的“与民争利”。他说：当官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平民怎么能争过他们这些有权势又有资金的官家呢？官家财富不断膨胀，“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己”。与此同时，平民百姓日益贫困化，“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汉书·董

仲舒传》)。这就是抓了很多人,犯罪还不能制止的根本原因。

董仲舒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这一问题。他首先引用孔子的话说:“不患贫而患不均。”不均,指财富分配不均。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有的人富了,有的人就必然要穷了。有一些贫富差别也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两极分化严重,就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盗与暴都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都产生于贫富两极分化。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巩固封建统治,董仲舒认为,要消除不安定因素,去其根源,需要采取措施,限制两极分化,缩小贫富差别,具体办法就是“调均”,“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春秋繁露·度制》)。

调均有什么具体办法呢?董仲舒提出的最重要的就是反对官家与民争利。他说:官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他又说:“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鲁相公仪休“拔葵去织”的故事就说明当官的有了俸禄,就不应该兼职,另外增加收入。董仲舒又说:“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汉书·董仲舒传》)当官的能够如此廉洁,下级就会称赞你的品行,服从你的教育,人民受到感化,也变得高尚起来,不再贪心和卑鄙。这样一来,民风也就好了。

关于调均的问题,《老子》的说法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农民起义军的口号是“均贫富”、“劫富济贫”,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年代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口号有相通之处,都是处于“贫”这一极的社会成员要求缩小贫富差别,主张共同富裕。我们在儒家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儒家出于仁爱之心而提出济贫的思想。贫苦者莫过于失去劳动能力又失去抚养(赡养)的鳏、寡、孤、独和废疾者,儒家主张救助他们,使他们都能得到“所养”(《礼记·礼运》)。西方强调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东西比较,中国的济贫救困更符合博爱精神,也更文明、更合情理,而西方的汰劣观则显得野蛮、残酷,与人道主义精神背道而驰。我们从这种意义上肯定董仲舒的调均思想还是有现实意义的。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西方许多国家以高福利的方式救助贫困者,其力度和广度都超过中国,说明如今西方人已经认识到调均的意义,劣汰的问题也需要重新加以评价。

少数国家在国内重视救助弱者,而在国际上却欺侮弱者,动不动就要对别国进行经济制裁、武力威胁甚至武装入侵,所谓耀武扬威,违背人性,此路不会走太远。

董仲舒论富,反对贫富两极分化,主张调均,特别反对官家利用权势与民争利,反对官商,反对盐铁官营。

综观秦汉时代以来的中国 2000 多年的历史,贫富问题一直是历代历朝政府所关心的民生问题。在社会自然发展过程中,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贫富两极分化,是一种自然趋势。历代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经常要打击一下贪官污吏,有时也要限制一下巨商富贾,在有天灾的年份,对受灾的人民还要给予适当的救济。这一系列措施,都包含调均的意义,实际作用就是缩小贫富之间的差别。有些统治者不知道调均对于巩固政权的重要意义,任凭一些皇亲国戚、功臣及其后代随意兼并土地,巧取豪夺,盘剥人民,为所欲为,不予制止,还要锦上添花,给予很多赏赐,而对于贫困的人民不予关心,任其自生自灭,结果不必太长时间,这个封建政权就要在农民起义中垮掉,取而代之的新政权就会立即采取措施进行调均,缩小贫富差别,以博得贫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我们认为,社会的自然发展,贫富差别日益扩大,政府如果无力制约富强者的势力而进行适当调均,那么,这个政权不被日益富裕的富人夺权,就会被日益贫困而无法生活下去的穷人推翻,没有执政能力的政府垮台是必然的。执政能力表现在经济上就是能否实行调均,政治上是否主持公道,用人上能否选拔贤才,总之,执政能力体现在能否解决最重要的现实问题。

调均,是对富人的限制,是对穷人的救助,但不能走极端,搞平均主义。承认差别,反对的只是差别的过分扩大。因此,调均要适度。理解不当,处理不当,调均也会产生副作用。

在现有的生产力条件下,社会还不可能在贫富贵贱方面都是平等的,还需要竞争,这样,社会才会在竞争中得以发展。如果贫富消失了,竞争淡化了,那么,社会发展也就没有了强大的动力,社会发展也会因此而缓慢下来。西方一些高福利的国家,向高收入的人征收高税,把大量的资金用于社会福利事业,实际上起到调均的作用。这种政策实行一段时间以后,社会竞争逐渐削弱,社会活力也逐渐减少,

养成一批懒汉和庸人。中国也曾经刮过“共产风”，吃过“大锅饭”，对生产力的破坏、对财物的浪费都是惊人的。在深刻的教训以后，我们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些事实有力地证明，根据现有的生产力的水平，贫富的差别还不应该消灭，还要保存，还要保护。从正反两方面的实际经验，我们体会到，贫富差别过大，两极分化，会激化阶级矛盾，导致社会动荡；贫富差别过小，过早实行平均主义，也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说，贫富不能差别太大，也不能差别过小。这就需要不断调整。不能进行这种调整的政府，是无能的政府，是会被推翻的政府。2008年7月12日阿根廷《民族报》报道，劳尔·卡斯特罗说古巴的社会主义应当符合现实。他说：“现实的社会主义在古巴的建立，这种社会主义将消除平均主义和过分补贴，在经济上则是可持续发展的。”又说：“社会主义意味洋洋大观社会公正和平等，是权利与机会的平等，而不是收入平等。平等不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归根结底也是一种剥削。”劳尔所谓“现实的社会主义”，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平均主义归根结底是一种剥削，这种观点发前人所未发。

政府应该如何对待人民致富？就是经济政策的问题。司马迁提出五种方针：因之、利导之、教诲之、整齐之、与之争。下面分别加以解说。

首先，因之，就是因循、顺应客观形势。这是黄老道家的自然无为的思想在经济领域的体现。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客观规律，统治者要顺应规律，不能根据个人的意愿，企图改变经济发展的自然进程。马克思提出，在人们思想觉悟和社会物质财富都达到高度发展以后，才能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度。而有些人却在两个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企图实施共产主义制度，以为下个命令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就像唐代武则天下令让百花在大冬天开放。权势者的意志、行政命令都无法改变客观规律，也改变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进程。唯意志的结果，不但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却起了破坏、阻碍的作用。司马迁根据文景时代的情况，认为“因之”是最善策，所谓“善者因之”。

其次，“利导之”。俗话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天下人奔向利，“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那么，统治者只要掌握着利，就可以指挥天下人，引导天下人，所谓“有钱能使鬼推

磨”。汉代独尊儒术，政府规定精通儒家经典的可以当官拿俸禄，享受荣华富贵。于是，天下士人，争读“五经”。经学大师也体会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敬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只要精通经书，要做大官就非常容易。由于利禄的引诱，天下士人读经、注经、讲经，不遗余力。一部经书，注文可以达到几百万字，甚至几个字也要注上数万言。这都是利导的结果。现在的利导，就是各国政府规定的各种优惠政策，免税、减税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内容；与此相反，则用高征税的办法来抑制某些商品进口与生产，这种抑制也是一种利导。

第三，教诲之。这种教诲，既有教师的教育作用，更重要的是政府的宣传作用。在封建时代，中国的政府宣传作用，主要通过下诏书，赞赏什么，提倡什么，嘉奖什么，反对什么，被称为“金口玉舌”的皇帝话语，被视为至高无上权威的“圣旨”，在百姓中都会产生很大影响。有一些御用文人，根据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提出一些政见，对社会也会产生极大的影响。例如董仲舒在汉武帝策问时提出官员不与民争利的思想对后代产生很大影响，现代有些国家规定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公务员不得从事商业活动，与两千年前的董仲舒的见解是一致的。现在所说的“政治思想工作”、“打通思想”、“造舆论”、“正面教育”、“批判反面教员”、“宣传”、“动员”、“鼓动”等等，都是“教诲”的新方法、新形式。

第四，整齐之。就是用法规来统一经济活动的规范，不允许少数人暴发横财，特别限制商业活动，各处都立关设卡妨碍交通运输。司马迁认为，政府利用行政手段限制百姓发财致富，是不可取的。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就是司马迁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就是司马迁所谓“教诲之”。这是儒家的两种办法。而孔子认为“道之以德”比“道之以政”高明，司马迁也把“教诲之”摆在“整齐之”之上，说明他们对此有一致的看法。但是，司马迁推崇黄老之学，把体现自然无为精神的“因之”放在首位，其次才是轻重家的“利道之”，再其次才是儒家的两种办法。

第五，与之争，即与民争业、争利。司马迁把这种办法排在最后，即最下策。黄老道家和儒家都反对这种办法。孔子说：“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篇》）百姓贫困，国君怎么能富呢？季氏很

富,冉求又帮助他搜刮民财,孔子很气愤,说冉求不是他的学生,还发动学生声讨冉求(《论语·先进篇》),说明孔子反对官员与民争利。在西汉时代,与民争利极为严重,最突出的是盐铁官营。上面提到,当时有些人靠冶铁和做盐生意发了大财。盐铁利润极高,于是,大商人出身的桑弘羊执掌政府财政大权以后,就将盐铁之利收归国家所有,不允许私人经营盐铁。董仲舒认为,这是“与民争利”,司马迁也这么看,后来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从各地选派来的文学贤良之士都激烈反对桑弘羊提倡的盐铁官营。

## 六 官营企业的利弊

盐铁官营究竟有什么好处,又有什么弊端?二者比较,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呢?

盐铁官营的好处是夺了富商大贾的大利,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汉武帝出巡时,带领浩浩荡荡的庞大队伍,耗用甚多,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所到之处,还赏赐臣民大量的布帛和金钱。他用兵征伐,扩疆守土,耗资无数,没有增加人民的税赋,全部由大农提供充足的费用。大农就是桑弘羊领导的负责盐铁等事务的政府机构。桑弘羊也说实行盐铁官营是为了“蓄货长财,以佐助边费”。如果罢去盐铁政策,那就会导致“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贍之”(《盐铁论·本议》)。这就是实行盐铁政策的现实意义。

反对者认为盐铁官营的弊端极大,应该取消。理由多得很,有几点值得现代人注意。

其一,官办企业生产的铁器多是大件的,是为了完成生产指标,又因为粗制滥造,质量很差,品种单一,农民使用很不方便,严重影响农业生产。

其二,官办企业由雇工生产,质量差而价格不

低,不像私营那样精心制作。在销售方面,官商的态度不好,从来不考虑顾客的方便与否,而私营企业为了竞争销售,千方百计为顾客提供各种方便,农忙时到田间地头推销商品,又可以赊账。

其三,私商多家竞争,促进质量提高、价格降低,改善服务态度;而官商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质量、价格都一样,没有挑选的余地。官商的铁器卖不出去,有时还推销派售。有时工厂完不成任务,还要派农民去帮忙,增加了徭役负担。

其四,私商较多,分布零散,农民买农具比较方便;官商摊点少,分布集中,有些农民要到很远的集镇上才能买到,特别是农忙时,花宝贵的时光,走很远的路买农具,划不来。农具又不能储备,储备多了,容易生锈、报废。

利弊大小之比,不能根据多少条的数量,更重要的是要看实际的客观效果。这个实际效果也还有不同的看法。从短期看,桑弘羊的盐铁政策确实为国家增加了大批的财政收入,解决了支边的经济困难。但长远看,官商不利于提高产品的质量,无法改善服务态度,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国家财政也会有重大损失,从总体上看,国库也会逐渐虚空的。说到底,还是孔子那一句话:“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夺百姓的财物,百姓不足,君也会不足。民穷君富,只能是暂时的。因此,藏富于民,是高明的见解。细审历代君臣,富民者国富,刮民者国贫。司马迁把“与民争利”看作是最下策,也是这个道理。

总之,古代儒家的财富观对现代社会尤其是中国当今社会状况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对个人怎么挣钱、如何花钱以及当官如何看待财富、政府如何对待财富,都有指导意义。

## 注释:

①该文系作者2008年在苏州大学所作的学术讲演稿整理删节而成,经我校黄开国教授约请而同意在我刊刊出。

[责任编辑:凌兴珍]